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志琴 编



文化危机与 展望

—— 台港学者
论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丛书

文化危机与展望

——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

上

刘志琴 编

中国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平

封面设计：孙晓红

文化危机与展望

——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上)

刘志琴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5.5印张 2插页 355千字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8.45元

为有源头活水来（代序）

台湾在五十年代常被人认为是“文化沙漠”，六十年代兴起中西文化论战，七十年代末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香港的学术也趋向繁荣。多年来台港学术界同仁为推进中国文化研究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引起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和兴趣。一国两制的方针，更加激励我们摒弃旧日成见，引进台港的学术成果，为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委托我选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以奉献给大陆的读者。

这本书统称为台港学者的作品，未必很准确，因为有些学者已经移居海外，成为海外著名的华裔学者，但是他们又无一例外，曾在台港从事学术活动，或者受教于台港的高等学府，由于这历史的渊源，我更愿意他们作为台港学界的使者，为大陆同胞所理解。如果因为有的海外学者受聘大陆的学术机构，而被台港的学人视为大陆使者的话，那更是体现了我们与彼岸通好的愿望。

这本书选编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活跃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学者27人的38篇论著和1篇座谈会实录，绝大部分都系在大陆首次印行。这里有蜚声中外的老一辈学者胡适、钱穆、张君勱、方东美等教授的著述；有遐迩闻名的韦政通、傅伟勋、文崇一、杜维明、余英时、林毓生、成中英先生的力作；也有从台湾成长的年青一代孙隆基博士的代表作。他们都有潜心研究，学贯中西的造诣，精思博识，见仁见智，从学术观点上大致有这

几种，简述如下：

儒学复兴论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暴露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矛盾，为了建立民族文化本位上的现代化，力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出某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在学理上承其陆王的统绪，重视传统的道德精神，从返本而开新，为现代化提供某种精神的动力。这是继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之后，又一次复兴儒学的主张，但在扬弃名教和思考方式方面又有所前进，因此称为新儒学或新传统主义。

中西文化平衡论 认为现代的文化建设是会通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桥梁，非守旧不足以开新，在因袭旧文化中求其变通，致其中和，以便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论 要正确解决文化的继往开来，必须彻底克服自我封闭的心态，做到这三点：1. 经由批判的继承谋求创造的发展；2. 以“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取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 形成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只要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发展，不论西学是体是用，皆可吸纳，与中学融为一体。

道德重建论 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面临新的危机，作为文化核心的道德观念必须重新建构，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所谓道德的重建，既非复古，又非趋新，更非三条大路走中间式的浮面折衷，而是积极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取向，是从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出发，向世界普遍的文化和道德进行整合的过程。

对传统创造的转化论 在抨击传统中的有害因素时，可以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重新解释与建构，使之成为有利于社会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中的健康、有生

机的质素加以改造，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合而产生的，所以对传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创造性的转化。

反传统主义 现代化是理性化的过程，它最有力量的表现是工业化运动，在工业化所到之处，传统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就面临解体。中国在世界性的现代化的潮流冲击下，整个传统已被淹没，只剩下很少的呼声，百年之后可能会有回应，但在当前现代化的过程中，某些理想观念并不能变成新文化中的相干因素，而新儒家思想的庸俗化却可以变成帝王之学或抗拒现代化的精神补偿。有的还认为，传统文化中并不寓有现代意义的观念，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

此外，还有“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等不同观点，以及西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胡适在七十年代的新作。值得提到的是，这里还全文刊载了1982年8月由台北《联合报》和中国论坛社联合主办的“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座谈会的记录。凡此种种，都力求收集，为全面了解台港的学术和流派提供第一手资料。

这本书编辑之际，也并非不无遗憾，由于不同政治体制的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五十年代在台湾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反共为主要政治倾向，为了不再重复过去的裂痕，对于当时的文论，则尽量予以讳避，但是只要是研究有素的学术成果，即便为大陆学者不能苟同的观点，或是对大陆的批评，也照录不误。由于历史形成的隔绝和十年浩劫进口图书的中断，使我们所见到的台港书刊不免有缺失，某些论题，有待后续，暂时未予收进，所以这本书又不尽能反映台港文化研究的全部历程。但是作为大陆发行的第一部全面介绍台港文化研究成果的选本，这本书又堪称一个新的起点。

海峡两岸的分裂是我们民族的不幸，真正结束这长期的阻

隔，还需要时间，但是历史造成的隔膜，又必将为历史的前进所消解，当前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已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1987年3月16日《新新闻周刊》创刊号发表编辑部独家专文《大陆“登陆”台湾？》，文中说：“最近一两年，大陆和台湾的实质关系愈来愈增，而且渐渐由地下转到地上。上个月，目前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傅伟勋教授正式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主张，认为只有透过双边的知识分子对话，才能找出两岸真正和解的途径”。同年7月25日台湾《自立晚报》报道，台湾学者向当局呼吁，放宽文化交流，并指出大陆的文化艺术涌进台湾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随着台胞赴大陆的探亲活动，在台湾掀起了大陆文化热，自发印行的大陆出版物已有数千种百万册，一些美学史、史学著作、小说等等，在台湾风行一时。1987年10月《中国论坛》第298期载文指出，台湾的报章杂志已经到了“没有大陆作家学者的作品刊登，则销路立即下跌的奇妙程度。”大陆同胞欢迎台湾文化艺术的热情，也不减于彼岸的民众。一些通俗歌曲、学术论著、小说也在大陆不胫而走，正是两岸民众渴求相互了解的热情，促进了解冻时代的到来，文化交流成为两岸和解的先声。

中华文化是哺育炎黄子孙的真正源泉，历史上多少次的分裂、阻隔和对立，总也挡不住文化上的依归和亲和，最终导向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不论是台湾文化的成就，还是大陆文化的发展，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文化力量以经济政治为背景，又不拘于经济政治的约束，它能穿越不同政治体制的垒障，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地理上的阻隔，在同文同种同一文化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引起共鸣。台湾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变迁的加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异，促使文化改革意识崛起。当前台港学者最关切的论题，诸如中国文化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转化？中西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价值观

念的变迁、国民性格的改造、新儒家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冲突与观念的失调、重建中国文化的展望，以及对新儒学的争议，文化论争的余波遗绪，又与大陆何其相似！事实证明八十年代台港文化研究的热点，已经超越五十年代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与八十年代大陆的文化热，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这是两岸捐弃旧嫌、携手合作的基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建设中国新文化，成为两岸学者在当代研究中国文化的共同使命。

正如大陆的读者对台港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怀着学习的热情一样，台港学者也注目大陆学术研究中的优势，以取长补短。《中国论坛》第294期上发表李祖琛先生《台湾社会变局下的社会科学家》一文说：“解严之后，加上开放大陆探亲，在长久的资讯封闭隔绝后，突然肇发这样一股大陆文化热潮，是不难理解体会的。大陆作家与学者的著作纷纷引介进来，若干著作所展现的宏观视野与强烈的企图心，对此地学界自造成不少冲击，尤其国内社会科学界向以实证研究为主流，这几年欧洲思想相继引入，视野才稍稍开阔些，然而台湾社会科学界，思想理论成份的稀薄，也是不容否认的。即使如此，两边的社会科学发展仍各有其不同取径：大陆学者的宏观视野固有助于科际整合工作之进行，台湾学者的微观角度则有助于独立学门的纵深发展；大陆学者传统史料的薰陶与取材便利，固对于落实‘社会科学中国化’有极大的裨益，然而台湾学者所亲身参与经历的台湾现代化的经验，也是大陆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一项优异条件。在两岸关系稍露曙光之际，两边的社会科学家尤应携手合作，在文化交流工作上多加尽力，不但可以为未来和平统一铺设良好基础，就社会科学进步所需的刺激与反省言，更是理应如此。”这番话深情地表达了彼岸学者对大陆学界的鞭策与厚望。

毫无疑问，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海内外文化研究的倾向又存在某种差异，弘扬传统的新儒家在海外非常活跃；在国内更多的知识分子对传统则持以批判的态度。在学术观点上可能有种种争议，但是这两种倾向又都源于建设中国现代化的思考。新儒家重视的是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发掘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以补偿现代文明的弊病，这对设计现代化的前景具有参考价值；抨击传统的则基于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因素，阻碍社会的变革，这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更有切入的意义。不论是台港学者的相互讨论，还是两岸学者的争鸣，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而上下求索。爱国主义使我们休戚与共，声息相连，中华文化缘此源头，必将奔涌出不竭的活水，可以深信，两岸学者共聚一堂对话磋商的时日已经指日可待，但愿这本书能寄寓我们这由衷的愿望。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编成得到科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CSES）的大力帮助、以及傅伟勋先生、梁从诫先生、林英先生、安京先生的指教和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刘志琴 1987.10

目 录

钱 穆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1) 中国文化与科学 (16)
文化的衰老与新生 (32)

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勱 唐君毅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45)

方东美

中国艺术的理想 (100) 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
(122)

唐君毅

中国哲学精神价值观念之发展 (155) 中国方法论中之
个人与世界 (178)

梅贻宝

中国社会思想与行为上的个人地位 (196)

牟宗三

作为宗教的儒教 (212) 中国文化的特质 (224)

刘子健

中国历史中统合的因素及其相互的影响 (254)

谢幼伟

个人在中国伦理中之地位 (266)

陈荣捷

中国宗教中之个人 (280)

朱岑楼

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论中国人性格的耻感取向——附
讨论(298)

杨懋春

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附讨论 (336)

沈其钧

老子的影响 (380) 西方文化与道家哲学 (403)

胡适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412) 中国传统与将来
(440)

孙隆基

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454)

钱 穆 (1895—)

江苏无锡人。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江南大学等校教职。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一九六七年在台湾定居。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论语新解》、《庄老通辨》、《朱子新学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数十种。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一)

今天我的讲题定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我只能从某一方面对此题讲些话。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说中国文化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国文化就在中国人身上。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人，亦就是说看中国

史上历来的人生与人物，即中国人怎样地生活？中国人怎样地做人？

人生应可分两方面看：一外在的，即人生之表现在外者；一内在的，即人生之蕴藏在内者。表现在外的人生又可分两大项目：一是人所创造的物，一是人所经营的事。易经上谓之“开物成务”。无此物、创此物，是为“开物”；干此事、成此事，是为“成务”。易经把“开物”“成务”两项都归属于圣人之功绩，可见中国古代人对此两项之看重。但此两项则都是人生之表现在外的。

现在人讲文化，主要都从这方面讲，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分法，是从“开物”观念上来讲的。又如：渔猎社会、畜牧社会、耕稼社会、工商社会等分法，是从“成务”观念上来讲的。

但这些多是人类怎样生存在社会乃至在天地间的一些手段，实不能认为即是人生之理想与目的。人生该有理想，有目的。既已生存在此天地间，究应怎样生、怎样做一人？这始属于理想目的方面，此之谓文化人生。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则在生存之上有向往、有标准，这就讲到了人生的内在面。这一面，中国人向称之为“道”。中国人用这“道”字，就如现在人讲文化。不过现在人讲文化，多从外面“开物成务”方面讲；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则定要在文化本身内部讨论其意义与价值。亦可谓文化中之有意义价值者始称“道”，而此项意义与价值，则往往不表现在外面，而只蕴藏在人生之内部。

如我们讲古代文化，一定会提到埃及的金字塔，亦是所谓“开物”。金字塔之伟大，诚然无可否认。由于此项建筑，我们可以连带想到古代埃及人的智慧聪明，和当时运用物质的能力。若非这些都有一甚高水准，试问怎会创出那些金字塔？但我们也该进一步问：那些金字塔对于埃及的社会人生，究竟价值何在？意

义又何在？

古的不提，且论现代。如我们提及太空人，提及把人类送上月球，不是当前一项惊天动地的壮举吗？这也十足可以说明近代人之智慧聪明及其运用物质的能力，到达了那样高的水准。但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样一项伟大工作，究竟对于现世界、现人生、实际贡献在那里？其价值何在？意义又何在？

象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乃及近代西方的太空人，都属于开物成务方面，都只表现在人生的外部。中国人讲“正德”“利用”、“厚生”。也不是为着争奇斗胜。不论你我在太空开物、成务，是有关利用、厚生的。但在此两项之上，还有“正德”一目标。而且“利用”、“厚生”轨迹中能绕多少圈，谁能先送一人上月球；但人生理想，究不为要送人上月球。送人上了月球，依然解决不了当前世界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换言之，此仍非人生理想以及人生的意义价值所在。照中国人讲法，智力及财力表现并不即是“道”。中国人讲“道”，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始是人生理想、人生大道，决不在乎送人上月球，当然也更不是要造几座更大的金字塔。从这一层，可以来阐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观。

(二)

我此刻，暂把人类文化分作两类型来讲：一是向外的，我称之为外倾性的文化；一是向内的，我称之为内倾性的文化。中国文化较之西方似是偏重在内倾方面。如讲文学，西方人常说，在某一文学作品中创造了某一个性，或说创造了某一人物。但此等人物与个性，只存在于他的小说或戏剧中，并不是在此世界真有那一人与此一个性之存在，而且也并不是他作者之自己。如莎士比亚剧本里创造了多少特殊个性，乃及特殊人物；然而此等皆属于

虚乌有。至于莎士比亚究是那样一个人，到现在仍不为人所知。我们可以说，只因有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才成为一个莎士比亚。也是说，他乃以他的文学作品而完成为一文学家。因此说，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之意义价值都即表现在其文学里，亦可说即是表现在外。这犹如有了金字塔，才表现出埃及的古文化来；也犹如有了太空人，才表现出近代人的新文化来。

但我们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里，如《水浒传》有宋江、武松、李逵等人物，《红楼梦》有林黛玉、贾宝玉、王凤姐等人物。这些人物，全都由作家创造出来，并非世间真有此人。但这些作品实不为中国人所重视，至少不认为是文学中最上乘的作品。在中国所谓文学最上乘的作品，不在作品中创造了人物和个性，乃是由作者本人之人物和个性而创造出他的文学作品来。如：《离骚》由屈原所创造，表现离骚中的人物和个性，主要的便是屈原他自己。陶渊明创造了陶诗，陶诗中所表现的，也是陶渊明自己。杜甫创造了杜诗，杜诗中所表现的，也是杜甫他自己。由此说来，并不是为屈原创造了一部文学，遂成其为屈原；正因为他是屈原，所以才创造出这一部文学来。陶渊明，杜甫也如此。在中国是先有了此作者，而后有此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中国诗人很多，而屈原、陶渊明、杜甫最受后人崇拜。这不仅是崇拜其作品，尤所崇拜的，则在作家自身的人格和个性。若如莎士比亚生在中国，则犹如施耐庵、曹雪芹，除其所表现在外的文学以外，其自身更无成就，应亦不为中国人重视，不能和屈原、陶渊明、杜甫相比。这正因中国文学精神是内倾的。要成一文学家，其精神先向内，不向外。中国人常说“文以载道”，这句话的意义也应从此去阐发。中国文学之最高理想，须此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道”。文以载道，即是文以传人，即是作品与作者之合一。这始是中国第一等理想的文学与文学家。

再讲到艺术，中国艺术也同样富于内倾性。如绘画，西方人主要在追求这幅画能和他所欲画的对象近似而逼真，其精神仍是向外，外倾的。中国人绘画则不然。画山不一定要象这座山，画树不一定要象这棵树；乃是要在他画中这座山，这棵树能表现出他画家自己的意境和胸襟。或者作画送人，却要这幅画能象他所欲送的人之意境和胸襟。所以在作画之前，尽管对一山今天这样看，明天那样看，但总感这山不能完全象我自己的意境。待慢慢看熟了，把我自己对此山所发生的各种意象拼合起来，才是我心里所希望所欲画出的这座山。在山里又添上一棵树。这树也并不是真由山中写生得来，仍是他意境中一棵树，而把来加在这山中，使此画更近我意境。所以中国画所要求的，重在近似于画家之本人，更过于近似于所画的对象。学西洋画，精神必然一路向外；但要做一中国画家，却要把精神先向内。

把文学与艺术结合，就是中国的戏剧。西方人演剧，必有时间、空间的特殊规定，因而有一番特殊的布景，剧中人亦必有他一套特殊的个性。总言之，表现在这一幕剧中的，则只有在这一时间、这一空间、这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又因有这样一个或两个特殊的人，而始有这样一件特殊的事。此事在此世界则可一而不可二；只碰到这一次，不能碰到第二次。他们编剧的意象结构惨淡经营的都着重在外面。中国戏剧里，便没有时间、空间限制，也没有特殊布景，所要表现的，不是在外面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某一人或某几人的特性上。中国戏剧所要表现的，毋宁可说是重在人的共性方面，这又即是中国人所谓“道”。单独一人之特殊性格特殊行径，可一不可二者不就成为道。人有共性，大家如此，所谓易地则皆然者始是道。道是超时空而独立存在的。如演苏三起解，近人把来放进电影里演，装上布景，剧中意味便受拘束而变了。中国戏台是空荡荡的，台下观众所集中注意的只是台上苏三

那一个人。若配上布景，则情味全别。如见苏三一人在路上跑，愈逼真，便愈走失了中国戏剧所涵有的真情味。试问一人在路上跑，那有中国舞台上那种亦歌亦舞的情景？当知中国戏剧用意只要描写出苏三这个人，而苏三也可不必有她特殊的个性，只要表演出一项人的共性为每个观众所欣赏。

深一层言之，中国戏剧也不重在描写人，而只重于描写其人内在之一番心情。这番心情表现在剧里的，也可说其即是道。因此中国戏剧里所表现的多是些忠孝节义，可歌可泣的情节。这些人物，虽说是小说人物，或戏剧人物；实际上则全是教育人物，理想人物，都从人类心情之共同要求与人生理想之共同标准里表现出来。这正如中国的诗和散文，也都同样注重在人生要求之共同点。中国人画座山，只是画家心里藏的山，而一画出来，则成为人人心所共想看的山。戏剧里演出一人，也只是作剧家理想中的人，而一演出来，则成为人心所共同欣赏的人。西方的文学艺术，注重向外，都要逼真，好叫你看了象在什么地方真有这么一个人、一座山。而中国文学艺术中那个人那座山则由我们的理想要求而有。这其间一向外，一向内，双方不同之处显然可见。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

(三)

外倾文化，只是中国易经上所谓“开物成务”的文化。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这种文化，偏重在物质功利，不脱自然性。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这样的人，则必然要具有一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从字面讲“文化”二字，也见在中国易经里，有曰“人文化成”。现